

明代书籍插图与人物肖像画关系研究

周 玫

(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内容提要: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市民阶层的形成,促进了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发展,戏曲、小说中的插图在继承宋元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明代的人物肖像画家面对人物画的弱势格局和蓬勃兴起的书籍出版业,积极为书籍创作插图,两者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共同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明代书籍插图 人物肖像画 相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 K879.3

文献标识码: A

图画与文字是古代人类文明得以流传的最主要的媒介,也是后人获取知识、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图画以生动的视觉艺术形象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以及生产生活的场景,而文字则以抽象的符号记载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因此,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的传播功能强大、丰富、准确,“相隔百万公里的人们有了文字就能互相沟通思想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享共同的书面知识、对过去和未来的共同之感。人类的思想变得能在广大范围里发生作用,千百个头脑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代能够相互引起反应,文字本身成了‘千年会说话’、自身能绵延的‘传媒’”^[1]。但是,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从原始的图像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则由于其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古代的形象文字一直沿用至今,充分显示出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密切关系。

尽管明王朝的统治者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制度,曾经大兴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但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社会城市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推动了市民文学的兴起。为充分迎合市民阶层的喜好,小说、戏曲等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文学作品中往往配有大量的插图。由于明代的小说内容主要以历史、公案、神怪、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诸如《封神演义》、《列国之战》、《北宋志传》、《英烈传》、《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石点头》、《西湖二集》、《醉醒石》,以及著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人物个性鲜明突出。戏曲人物更需要依赖特定的背景表达剧情,因此,明代的小说和戏曲中的插图对人物肖像画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代书籍插图的需要,呼唤着人物肖像画家参与创作。元明时期已经走向衰落的人物肖像画重新在书籍插图艺术创作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明代书籍插图与人物肖像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 明代书籍插图的渊源

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成果主要是依靠文字资料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因为我国的历史脉络未经中断,许多古代典籍得以传流,后世又有大量笺注,形成了丰富的文献宝库”^[2]。然而,原始社会的各种图像演变到文字符号以后,并未终止自身的发展,以笔墨线条构形的中国古代绘画也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文字与图像之间也从未中断过相互交流和促进,图像内容需要文字来加以说明,文献中被插入图画,以此来更加形象地展示文字所描述的对象。田野考古资料已经证实,至少在战国秦汉时期,在一些竹简和帛书上就有了后世“图文并茂”、“左图右书”等图文结合形式的实例。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一件帛书《月忌篇》,中间是文字,四周绘有12幅图像,图像旁有小段文字,12个神像是“图”,文字说明

收稿日期 2008-12-22

作者简介 周玫(1965~),女,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艺术品。



图一// 帛书《导引图》，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明伯虎唐寅寫

图二// 《西厢记考·莺莺像》，明万历年间刊本



图三// 《千金记·鸿门》，明万历年金陵书肆继志斋陈氏刊本



隨嘉會喧賓奪主行末則旅砂一巨觴同醕

古徐子生

陶朱公 七葉三瓶千金三撥破薄皮人與世鉅券

图四// 陈洪绘《博古叶子·陶朱公》

是“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人字》简,上面是两个张开双臂、叉开双腿的人形图,下面是文字。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多件帛书,其中的《导引图》、《天文气象杂占》以及帛书地图上,均有文字和图像。《导引图》(图一)长约100、高约50厘米,上绘44人,分4排,每排11人。从形态和服饰来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穿长袍,有的穿短裙短裤,甚至裸背,以黑色线条勾画人物轮廓,然后再填以朱红或青灰带蓝色。《导引图》上还残留有31处文字,内容主要与所画人物的姿态有关^[3]。著名的带巫术性的地理书《山海经》,许多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本来是图画和文字并载的,而图画更早于文字,并从《山海经》中的文字分析出图像的存在,如《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杯食”;这当然是图中有些犬形的人据了上坐,下面跪着一个进食的女子,标题为‘犬戎国’,因为他们正在吃饭,所以写了一个‘方’字^[4]。

汉代以降,由于纸张的发明、书体的简化,尽管文字与图像相结合的传统有逐渐淡化的趋势,但却从未中断,特别是在一些宗教典籍中,为便于信徒对教义的理解,经常配有佛道神像。1899年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多达几万卷的文书写本,其中有不少绘有插图;在这些手抄的佛经中,有不少绘制精美的插图,有卷首扉页画,也有经卷插图。插图的风格,既有单线的白描图,也有似壁画的浓墨粗线图,有墨色的,也有彩绘的^[5]。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唐代雕印的图书主要是佛经、佛像,另有经书、医书、历书等。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两宋都城汴梁、临安成为雕印、销售图书的中心。书籍的插图类别囊括了以图解经的经书插图、以图明史的史书插图、以图娱民的小说与戏曲插图,以及以图释文的实用图书插图等^[6],几乎所有种类的书籍均可以配有插图,为明代书籍插图的繁荣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明代书籍插图的繁荣对人物肖像画的影响

明代书籍插图繁荣的经济基础是手工业与商业的迅猛发展,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形成有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商品经济的繁荣,金钱成为强有力的思想形式,学位、官职都可以通过金钱公开捐得,这样就吸引着



图五//《全真宗祖图·紫阳张真人》

一部分文人投身商海,他们可能是科举落第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是在位的官员,曾经贵为首辅的张居正也曾从事经商^[7]。到明代中叶以后,形成了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等著名的商人和商业集团,这些商人与城市手工业工匠、商人和平民共同形成了新兴的市民阶层。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推动了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市民文学的发达,加上明王朝对书籍出版的鼓励政策,洪武年间免除了书坊的书籍税,使民间刻书、印书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戏曲、小说的插图也顺应着这一潮流,插图数量和质量得到很大提高,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一格局对明代的人物肖像画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书籍出版业的繁荣为人物肖像画家投身插图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明代的皇



图六// 陈洪绘《九歌图·屈子行吟图》



图七// 《群仙集·三教混一图》

帝除了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制度外,还重视学校教育,明永乐皇帝朱棣曾集中全国的文化力量编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并建文渊阁收藏图书,不惜重金购买天下遗书。皇家对书籍的重视,对民间的文化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书籍印刷得到空前的繁荣,京城有国子监的官刻图书,全国各地还有富商缙绅的私刻图书,最活跃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书坊刻书。坊刻图书的品种很多,最主要的是人们日常所需的各种医书、方技书,以及戏曲、小说等通俗读物。为充分满足市场需要,“像早期的‘变文’一样,这些通俗读物往往附有插图,图文并茂,深受民间读者的欢迎,并逐渐引起官刻、私刻的模仿”^[8]。因此,书籍插图在明代的图书印刷中具有普遍性,并形成了建安派、金陵派、武林派、新安派等不同风格的刻书中心。

插图书籍的畅销与其高额利润,一方面促使书商提高书籍的印刷质量,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插图的艺术性。书籍插图的设计,一般先由画师绘出样稿,然后由刻工雕刻制版,另有一些手绘插图和套色插图。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书坊的经营者开始聘请当时著名的文人人物肖像画家为所

要刻印的书籍画插图,一部分画家面对金钱的诱惑也欣然接受,在明代插图艺术史上留下了他们浓重的一笔。明代著名的人物画家据《明画录》记载有“上官伯达、戴进、吴伟、杜堇、郭诩、周臣、唐寅、仇英、尤求、宋旭、丁云鹏、崔子忠、陈洪绶、曾鲸、萧云从等”^[9]。其中的唐寅、仇英、丁云鹏、陈洪绶、萧云从等都为书籍画过插图。如擅长画美女的唐寅为《西厢记考》(图二)、《西厢记杂录》等作画;仇英为《列女传》、《千金记》(图三)、《北西厢记》等配插图;丁云鹏为《养正图解》、《方氏墨谱》、《程氏墨苑》等书籍作画;陈洪绶为《新镌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张深之先生北西厢秘本》等作画,并与仇英合绘《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真本》,同时还画有《水浒叶子》、《博古叶子》(图四)等插图,萧云从画有《离骚图》插图。此外,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众多的人物画家参与到书籍插图的创作之中,如文征明门下弟子钱谷为《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樱桃梦》绘插图;顾正谊为《笔花楼新声》、《顾仲方吟物图谱》等作画;新安名画家吴左千为《屠赤水先生批评荆钗记》等作画;新都画家程起龙为《孔子家语图》、《女范编》等作画;画家蔡冲寰为《红拂记》作画,并与他人合作为《明珠记》、《陈眉公先生批

评六合同春》、《幽闺记》等作画,画家汪修为《四声猿》、王少淮为《东西进演义》、汪樵为《新镌全像蓝桥玉杵记》、陈一贯为《海内奇观》等作画^[10]。文人人物肖像画家参与书籍插图的设计,不但给经营者带来了直接的丰厚利润,也间接地促进了书籍艺术性的提升与人物画艺术的传播。

另一方面,书籍插图保留了前代的人物画成果,为人物肖像画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借鉴。在明代以前,尽管已经有了在书籍中穿插图画的传统,但这些图画主要还是由工匠自己画稿、自己刻印的,相对于文人绘画艺术来说,其艺术性并不高。明代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文人士大夫观念的改变,文人画家为书籍配插图成为普遍现象。这些由著名书画家设计创作的人物故事画,相比于书画作品的流传要广泛得多,虽然其作品经过了工匠的雕刻,画面已不如图画来得生动,但其人物形象的勾画线条和神韵却被保留下来了。书籍的插图将前代的画作保存下来,方便了后人的摹绘,著名的《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能够流传至今,就是由于能够从书籍插图中找到母本,经过后人的多次摹绘得以保存下来。这套《全真宗祖图》(图五)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绘写善本《宝善卷》中,根据记载,这套全真宗祖图流传有序,它是由明万历皇太后命僧人海澄绘制的,最后完成时间是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孟秋之季。“不过,海澄并不是原图的原创者,他是根据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木刻本的图像摹出的,嘉靖木刻本的全真祖师图像则是袭自布衣戴朴素的天顺年间的原刻本的全真祖师图,而戴朴素原书的《道门全真宗祖宝字降升仙像》,又是‘遵混元子汤道明刊行《道德全真祖师图》’绘成”^[11]。因此,书籍插图对人物画作品的流传曾经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著名画家的书画作品是很名贵的,能够占有它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富商大贾,一般人是很难以拥有或有机会亲眼目睹的。明代戏曲、小说中的插图既然有不少当时社会上著名的画家参与创作,其插图的艺术价值是很高的,比如陈洪绶所画的《九歌图·屈子行吟图》(图六)插图,画面人物面部憔悴、身体羸弱、高冠宽衣、挟带长剑,皆合屈原自述之实,把屈原爱国爱民、流涕长叹之神态刻画入微,千载之下,如见其人。此像向为后世画家创作屈原之像之楷模,很多人心目中之屈原形象皆来自此图^[12]。因此,这些插图无疑成为学画者最好的临摹对象。戏曲、小说中的插图犹如一幅幅形象生动的人物故事画,不但方便读者理解戏曲、

小说中的情节和内容,也为人物画爱好者打开了一扇自学钻研的窗户。明代书坊刻印的画谱,更是对中国传统绘画题材、技法等内容的传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刻印的画谱是画家的样稿。如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杭州武林双桂堂刊刻、明朝画院派著名画家顾炳编的《历代名公画谱》(又称顾氏画谱),选辑唐至元明画家顾恺之、张僧繇、阎立本等108位画家,共108幅作品。每幅都细摹精刻,前图后传,实为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绘画史。在名人画作深藏宫苑密室的古代,这样一部画谱的发行,无疑对习画者和创作者来说是最好的参照。

三 明代人物肖像画的成就促进了书籍插图艺术水平的提高

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作为“成教化,助人伦”的最有效的载体的人物画,曾经取得过十分辉煌的成就,在六朝以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然而,伴随着山水画、花鸟画的兴起,人物画从三分江山有其一,至元明时期逐渐居于次要地位。明万历时期的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到:“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复画人物及故事。”此话未免有些夸张,只是相比于文人画家致力于山水画、花鸟画的潮流,人物画确实似乎走向了衰落。面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发展的大趋势,明代的人物画家并没有丢弃传统,中断人物画的创作;相反,从人物画擅长于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特点出发,在明代戏曲、小说书籍插图创作上大显身手。大多数插图是画家为书本故事内容特别创作的,另外有一部分插图是按照书本内容从现成的画作中选取的。这些被选来做插图的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如陈洪绶所画的《九歌图·屈子行吟图》。它们并非专门为《楚辞述注》而作,而是早前陈与来凤季交游时所画,被来凤季所珍藏。崇祯十一年(1638年)来凤季将《楚辞述注》付梓时,将这些收藏的图画用作了插图。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代《群仙集》中的彩绘《三教混一图》(图七),与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代成化皇帝朱见深所画的《一团和气图》十分相似,但《一团和气图》为原本,《三教混一图》是摹本。著名的画作被书籍插图所采用,提高了书籍的质量和艺术性。

明代以前的书籍中,插图数量较少,有些甚至只有扉页配图,而且由于绘图的工匠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雕刻的工艺技术也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因此,雕印出来的书籍插图的艺术性较差。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插图,以古朴稚拙为特征,人物形象简练、线条粗犷。郑振铎先生在鉴定明万历十七年

(1589年)天都外臣序刊本《忠义水浒传》的插图时所说的那段话：“那些插图，气势豪放，人物都重点突出，显得有中心，背景比较地不那么细致地表现出来，线条比较疏朗，可看出不会是万历末期或启、祯二朝的所作，当然更不会是清初的所作了”^[13]，可以反证明代早期或以前的插图是比较粗率的，它们均出于民间的画工、刻工之手。由于明代小说创作的繁荣，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需求量大幅上升，书籍雕印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同时，对书籍插图人物造型和神韵的刻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代的人物画家也面对逐渐衰落的局面，需要有所突破。两者不谋而合，连明代最著名的画家唐寅、沈周、文征明、仇英等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书籍插图的创作。明末清初最有名望的人物画家陈洪绶更是为多部戏曲、小说作插图。此外，还有不少画家既能画插图，也能将图画刻成版子印刷，将插图的构思与制作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如明末画家刘素明，集插图绘画的创作、刻版、印制于一身，在《陈眉公先生批评玉簪记》的插图中，有的署“刘素明镌”，有的则署“素明图书”，表明他是一位能画擅刻的名家。著名人物画家丁云鹏也是一位善画能刻的名家。此外，徽派的刻工也深谙画事；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仅是刻书能手，而且是能书善画及自行布稿的雕刻大师^[14]。在画家谙知刀刻规律、刻工兼通绘事的背景下，明代的书籍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是在美术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总之，明代的书籍插图与人物肖像画有着密

切的关系：明代书籍出版事业的繁荣，城市平民对通俗小说、戏曲故事的偏爱和需求，促进了书籍插图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呼唤有较高艺术创作能力和艺术素养的人物肖像画家从事书籍插图的设计和创作；明代人物画的相对弱势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物肖像画家拓展创作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因此，书籍插图与人物肖像画的创作在明代这个城市和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得到了紧密的结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1][7][8]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34~35、251、277页。

[2]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见李缙云编《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页。

[3]侯良编著《尘封的文明——神秘的马王堆汉墓》，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2~323页。

[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89页。

[5][6][10][14]徐小蛮、王福康《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58~70、141~142、108页。

[9]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62页。

[11]王育成《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2]陈传席编著《陈洪绶版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3]郑振铎《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42页。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llustrations and the Portraits in the Ming Dynasty

ZHOU Mei

(Nanjing Museum, Nanjing Jiangsu 210016)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urban economics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China feudal society developed dramatically. Townspeople stratum came into being and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r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traditional opera and novel. Meanwhile, the illustrations in traditional opera and novel acquired an unprecedented flourish on the basis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Ming portraitists, facing the booming publishing and weak portrait, actively created illustrations for books. Both above-mentioned factors established a correlation of close connec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book illustration of Ming Dynasty ; portrait ; correlation